

人口城镇化与城镇化用地关系研究

——以江苏省为例

张光宏 崔许锋

【摘要】文章采用熵权法、综合发展评价模型、均衡发展模型对江苏省经济发展过程中人口城镇化与城镇化用地的耦合度、发展度、耦合发展度、空间均衡性进行研究。结果发现,人口城镇化与城镇化用地的均衡性和非均衡性状况同时存在。人口城镇化与城镇化用地的关系问题存在尺度敏感性,二者在省域尺度的均衡不代表内部空间的均衡。以城市为基本单元的研究显示,不同城市均衡性发展阶段、滞后类型不同,因此,促进城镇化健康发展需要针对不同城市 and 不同发展类型采取相应的措施。

【关键词】城镇化 非均衡性 耦合发展模型 空间格局

【作者】张光宏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工商管理学院,教授;崔许锋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工商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

一、引言

随着中国人口的快速城镇化,城镇用地空间扩张十分迅速,针对人口城镇化过程中用地扩张是否合理,城镇化用地水平与人口城镇化水平相比是过度还是滞后,二者的关系如何,学界已经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在已有研究中,大部分学者认为,人口城镇化与城镇化用地存在非均衡性,城镇化用地过度和人口城镇化相对滞后是主流观点(戴中亮等,2010;乔润令,2012;胡存智,2013)。但是,随着研究的深入,有些学者开始质疑这种观点,认为部分区域也存在城镇化用地滞后的情况(陈凤桂等,2010)。还有学者从区域性的研究数据出发,认为人口城镇化与城镇化用地在部分区域呈现总体均衡的状况(李明月、胡竹枝,2012)。对于非均衡性问题,有学者认为原因在于土地的粗放利用、无序扩张,需要限制城镇化用地扩展速度,合理有序地开发利用土地资源(姚士谋,2011)。也有学者认为问题不在于城镇化用地扩展的过度,而在于人口城镇化的发展滞后,解决问题的方法是推进户籍制度改革、建立合理的人口导入机制,推动人口城镇化的合理健康发展(范进、赵定涛,2012)。还有学者认为其原因在于征地过程中失地农民问题,解决失地农民的城镇化问题是关键(戴中亮等,2010)。

已有研究多从定性的角度,在理论上探讨二者的关系及解决措施,这样的分析由于缺

少计量支撑,缺乏说服力。有的研究从总体上评判中国人口城镇化与城镇化用地的关系,缺少对空间均衡性的分析,使研究结果局限化,忽视了区域的差异性。也有研究从城镇化率和城市建成区指标对比的角度去分析二者增长速度与均衡性问题,把人口城镇化和城镇化用地局限于人口的转移和土地的空间的扩张,不能完全反映人口城镇化和城镇化用地的内涵,出现“复合问题”单一化的问题。本研究以江苏省为例,从系统学的角度,将人口城镇化和城镇化用地作为城镇化母系统的两个有机的子系统,构建综合评价模型和均衡发展模型,从定量的角度评价二者的发展水平和均衡性,从时间和空间上分析江苏省城镇化的发展状况和空间异质性。

二、模型建立

(一) 指标权重算法(熵权法)

在城镇化综合发展水平评价中,本文采用熵权法计算人口城镇化与城镇化用地综合评价指标的权重。具体计算步骤是:设 r_{ij} 表示第 i 年第 j 个城镇化指标值, $i \in [1, m]$ 且 $i \in N$, $j \in [1, n]$ 且 $j \in N$ 。首先计算第 j 个城镇化指标第 i 年的指标值的比重 $p_{ij} = r_{ij} / \sum_{i=1}^m r_{ij}$ 。然后计算第 j 个城镇化指标的熵值: $e_j = -k \sum_{i=1}^m p_{ij} \cdot \ln p_{ij}$, 其中, $k = 1/\ln m$ 。最后得出第 j 个城镇化指标的熵权值: $w_j = (1 - e_j) / \sum_{j=1}^n (1 - e_j)$ 。

(二) 综合发展水平评价模型

人口城镇化与城镇化用地作为城镇化母系统的两个子系统,其综合发展水平可以采用指标加权法求得。综合发展水平是一种系统内的相对发展水平,表征了两个子系统该年度在整体评价体系中的相对水平。于是, $u_i = \sum_{j=1}^n \lambda_{ij} u_{ij}$, 且 $\sum_{j=1}^n \lambda_{ij} = 1$ 。其中, u_i 为子系统中第 i 年的综合发展指数, u_{ij} 为指标 j 对系统的贡献值, λ_{ij} 为城镇化指标的权重。指标功效贡献值 u_{ij} 采用功效函数求得。

$$u_{ij} = \begin{cases} (x_{ij} - \beta_{ij}) / (\alpha_{ij} - \beta_{ij}) & (u_{ij} \text{ 具有正向功效}) \\ (\alpha_{ij} - x_{ij}) / (\alpha_{ij} - \beta_{ij}) & (u_{ij} \text{ 具有负向功效}) \end{cases}$$

其中, u_{ij} 表示变量 x_{ij} 对系统功效的贡献的大小, $u_{ij} \in [0, 1]$, 当 $u_{ij} \rightarrow 0$, 对该系统的功效变小, 当 $u_{ij} \rightarrow 1$, 对该系统的功效变大。

(三) 均衡发展模型

借鉴物理学中的容量耦合原理,采用容量耦合系数来表示系统之间的协调程度(白先春等, 2005), 设 $u_i (i=1, 2 \cdots m)$, $u_j (j=1, 2 \cdots n)$, u_i, u_j 分别表示多个系统有序发展的评价指数, 于是多系统耦合模型为: $C_n = \{ (u_1 \times u_2 \times \cdots \times u_n) / \prod (u_i + u_j) \}^{1/n}$ 。那么, 对于人口城镇化与城镇化

用地的双系统,则模型可以写为: $C_2=\{(u_1 \times u_2)/[(u_1+u_2)/2]^2\}^{1/n}$ 。其中, C_2 为两个系统的耦合度, $u_i、u_j$ 分别为两个系统的综合评价指数, n 一般取6,耦合度 $C_2 \in [0,1]$ 。当 $C_2 \rightarrow 0$,表示两个系统趋于失调,失调性趋大;当 $C_2 \rightarrow 1$,表示两个系统趋于协调,协调性趋大。但 C_n 仅反映出系统间的协调程度,而系统的综合发展程度却不能表达,为了区别低水平的协调与高水平的协调,需要引入耦合发展模型,构建一个既可以反映系统间的协调程度又能表达发展程度的模型。于是, $D=(C \times T)^{1/2}$, $T=\alpha u_1+\beta u_2$ 。其中, D 为城镇化用地与人口城镇化系统的耦合发展度,反映了两个系统的均衡发展水平, C 为耦合度, T 为发展度。 T 是由 $u_1、u_2$ 加权修正而

来,表达了两个系统的综合发展水平,即是发展对于耦合发展的贡献度(毕丽芳、马耀峰,2013)。鉴于人口城镇化与城镇化用地同等重要的地位,取 $\alpha=0.5,\beta=0.5$ 。为了能定性研究二者均衡发展的阶段,参考已有研究的划分标准(廖重斌,1999;王永明、马耀峰,2011),根据耦合发展度值将系统耦合发展划分为5个阶段(见表1)。

表1 耦合发展度等级划分标准

等级	耦合发展度 D	类 型
五	0.00~0.19	落后发展失调
四	0.20~0.39	滞后发展失调
三	0.40~0.59	均衡发展过渡
二	0.60~0.79	初级发展均衡
一	0.80~1.00	高级发展均衡

本文采用的数据来源于《新中国六十年统计资料汇编》和2000~2012年《江苏统计年鉴》,为了消除物价上涨因素对经济的影响,采用GDP平减指数对GDP和二产业产值进行平减。计算公式为: $RGDP=GDP/p$; $RGDP_{二产业}=GDP_{二产业}/p$ 。其中, $RGDP$ 为实际GDP, p 为GDP平减指数, $RGDP_{二产业}$ 为二产业实际GDP。GDP和二产业GDP是根据当年价格计算的国内生产总值,是一种名义产值。实际GDP和二产业实际GDP是经过价格平减后的实际国内生产总值,是按不变价格计算的产值。

三、人口城镇化与城镇化用地水平及发展阶段

(一) 人口城镇化与城镇化用地发展水平分析

本研究采用综合发展评价模型对江苏省人口城镇化与城镇化用地综合发展水平进行评价,结果如图1所示。从图1可以看出,江苏省人口城镇化与城镇化用地自1978年以来一直处于上升趋势。中国改革开放以来,逐步实现了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极大地促进了经济增长,江苏省作为长三角重要组成区域,经济发展尤为迅速。江苏省产业的发展对劳动需求增大,吸引了大量的农村人口进城务工,拉动了农村人口的城镇化。

对比江苏省人口城镇化和城镇化用地的综合发展水平指数,可以将二者发展过程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为城镇化用地相对滞后阶段(1978~2008年)。这一阶段城镇化用地相对滞后于人口城镇化发展,人口城镇化拉动城镇化用地发展。第二个阶段为城镇化用地超越人口城镇化阶段(2009~2011年)。由于城镇化用地在2001年开始其发展速度大于人口城镇化,使城镇化用地在2009年达到并超过了人口城镇化。其原因在于没有考虑到人口城镇化的需求,盲目追求经济效益。地方政府利用征地差价,在没有合理估算土地需求量的情

况下,大规模征用农村土地,导致大量耕地非农化。

设人口城镇化函数为 $F_p(x)$ 、城镇化用地函数为 $F_L(x)$,二者的导函数分别是 $\frac{d[F_p(x)]}{d(t)}$ 、 $\frac{d[F_L(x)]}{d(t)}$,即为二者的发展速度。根据人口城镇化和城镇化用地的导函数大小,将二者发展速度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为 $F_L'(x) < F_p'(x)$ (1978~2000 年),这一阶段城镇化用地速度低于人口城镇化速度,人口城镇化与城镇化用地差距增加。当然 1989、1990 年前后存在拐点,但这不影响总体的趋势。第二阶段为 $F_L'(x) > F_p'(x)$ (2001~2011 年),这一阶段由于城镇化用地速度大于人口城镇化速度,二者差距进一步缩小,并且城镇化用地在 2009 年超过人口城镇化。城镇化用地迅速增长的原因主要有房地产业发展对土地市场的拉动、经济发展中的开发区“大跃进”、征地过程中的利益驱动等。1980 年实施住房体制改革以来,尤其是 1998 年中央政府下发文件要求停止城镇居民住房实物分配,房地产业开始蓬勃发展,拉动了城镇用地的快速增长。另外,地方政府基于长期税收的考虑,大量设置工业开发园区招商引资。在征地过程中,地方政府和相关投资者可以获得土地增值收益的 60%~80%,如此大的利益驱动,使地方政府有极大的动力对农村集体土地征用,以增加地方财政收入,于是形成了城市“征地—卖地—收益”的粗放的土地经营模式(辜胜阻、杨威,2012),这种“土地财政”模式促使城镇化用地迅速增长。

(二) 人口城镇化与城镇化用地发展变化的 5 个阶段

根据 1978~2011 年江苏省耦合度、发展度、耦合发展度(见表 2),可以将江苏省人口城镇化与城镇化用地的发展变化分为 5 个阶段。

1.落后发展失调阶段(1978~1991 年)。这一阶段城镇化用地与人口城镇化的耦合发展度处于 0.2 以下。原因在于耦合度和发展度均处于较低的水平,耦合度低于 0.4,发展度低于 0.1,较低的发展度拉低了耦合发展度,导致发展水平低。虽然 1982 和 1983 年耦合度相对稍微较高,但由于发展度水平低,没有表现出相对较高的均衡发展水平。

2.滞后发展失调阶段(1992~2001 年)。这一阶段城镇化用地与人口城镇化的耦合发展度在 0.2~0.4 之间,属于相对失调阶段。从耦合度的单一维度看,江苏省从 1992 开始耦合度有大幅度的提升,协调水平已处于勉强协调到中度协调的阶段,但发展度仍处于 0.3 以下,发展度较低,严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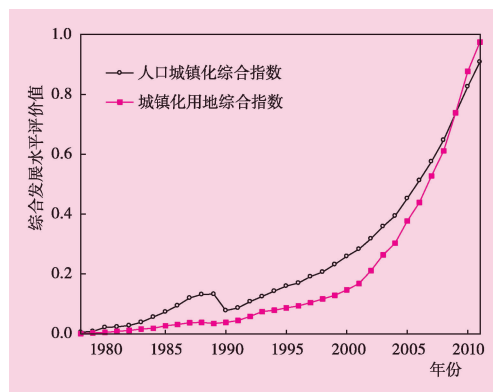


图 1 人口城镇化与城镇化用地综合指数对比

注:人口城镇化综合指数包括的指标为:城镇人口比重、二三产业产值比重、恩格尔系数、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社会消费零售总额、万人拥有医生数、在校学生数;城镇化用地综合指数包括的指标为:城镇建成区面积、地均固定资产投资、地均财政收入、地均二三产业产值。

表 2 人口城镇化与城镇化用地均衡发展度

年份	耦合度	发展度	耦合发展度	年份	耦合度	发展度	耦合发展度
1978	0.0007	0.0025	0.0013	1995	0.5712	0.1226	0.2646
1979	0.0824	0.0048	0.0199	1996	0.5861	0.1311	0.2771
1980	0.0317	0.0124	0.0198	1997	0.5760	0.1471	0.2911
1981	0.1710	0.0152	0.0509	1998	0.6115	0.1610	0.3137
1982	0.2889	0.0189	0.0738	1999	0.5961	0.1801	0.3276
1983	0.3120	0.0269	0.0916	2000	0.6179	0.2024	0.3536
1984	0.1657	0.0369	0.0781	2001	0.6656	0.2249	0.3869
1985	0.2225	0.0495	0.1049	2002	0.7772	0.2638	0.4528
1986	0.1667	0.0622	0.1018	2003	0.8682	0.3110	0.5196
1987	0.1365	0.0779	0.1031	2004	0.9008	0.3483	0.5601
1988	0.1103	0.0844	0.0965	2005	0.9514	0.4144	0.6279
1989	0.0772	0.0831	0.0801	2006	0.9647	0.4759	0.6775
1990	0.4701	0.0573	0.1641	2007	0.9885	0.5513	0.7382
1991	0.5115	0.0651	0.1824	2008	0.9950	0.6293	0.7913
1992	0.5692	0.0825	0.2167	2009	1.0000	0.7377	0.8589
1993	0.6688	0.0992	0.2575	2010	0.9946	0.8518	0.9204
1994	0.5887	0.1103	0.2548	2011	0.9925	0.9421	0.9669

影响城镇化用地与人口城镇化的均衡发展水平。

3.均衡发展过渡阶段(2002~2004 年)。这一阶段是滞后发展失调向初级发展均衡的过渡阶段,也是人口城镇化和城镇化用地从失调迈向协调的阶段。

4.初级发展均衡阶段(2005~2008 年)。这一阶段,耦合度处于较高的水平,平均在 0.7 以上,处于良好的协调状态。发展度提高较快,由 0.3 增加到 0.6,增加了 1 倍

多,发展度和耦合度差距缩小,引致了耦合发展度的增大、均衡发展水平的提高。这个阶段是初级发展均衡向高级发展均衡的过渡阶段,处于非常重要的位置。

5.高级发展均衡阶段(2009~2011 年)。这一阶段耦合度处于较高的水平,处于 0.9 以上,发展度也处于相对较高的水平,平均在 0.7 以上。耦合度和发展度水平较高,耦合发展度位于 0.8 以上,达到高级发展均衡型阶段。

在江苏省人口城镇化和城镇化用地出现高级发展均衡的同时,由于省内区域的异质性,不同区域人口城镇化与城镇化用地表现出不同的特征,部分区域仍然存在人口城镇化与城镇化用地非均衡性的问题。所以在分析江苏城镇化均衡发展阶段的同时,需要进一步对江苏省内部不同的县域进行城镇化均衡性空间格局的分析。

四、人口城镇化与城镇化用地空间异质性分析

本研究采用 2011 年经济数据,对江苏省 51 个县(县级市)和 13 个市辖中心城区共 64 个县域^①进行人口城镇化与城镇化用地的非均衡性分析。对江苏省采用的地域分区方法为官方划分方法,即为苏南、苏中和苏北。苏南包括南京、苏州、无锡、常州、镇江 5 个地级市;苏中包括扬州、泰州、南通 3 个地级市;苏北包括徐州、连云港、宿迁、淮安、盐城 5 个地级市

① 地级市市辖区,人口、经济与社会关系整体性强,所以将地级市市辖区作为一个经济整体来进行评价,计量采用的数据来源于 2012 年《江苏统计年鉴》。

(江苏省统计局、国家统计局江苏调查总队,2012)。

(一) 综合发展水平的空间异质性

根据人口城镇化发展水平综合评价结果(见图2),可将江苏省县域分为4级。第一级包括南京、无锡、苏州、常州、徐州、南通、扬州、淮安、盐城、镇江、连云港11个地级市辖区和江阴、昆山、常熟、张家港、宜兴5个县级市。第四级含高淳县、建湖县、滨海县、句容市、阜宁县、盱眙县、溧水县、扬中市、灌南县、洪泽县、响水县、金湖县,共12个县域,其余为第二、第三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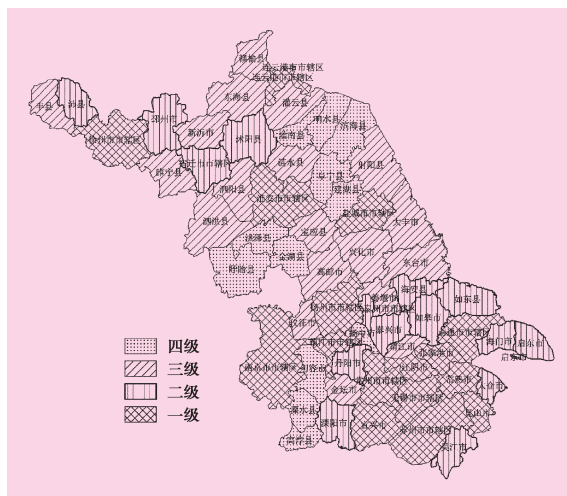


图2 2011年江苏省人口城镇化综合发展指数

根据人口城镇化发展水平的空间格局可知,第一级中仅有1个县域位于苏中,其余均位于苏南,且市辖区的人口城镇化水平高于郊县(县级市),于是有 $UP_{市辖区} > UP_{郊县}$ 。第二级中15个县域中仅有2个位于苏北,其余13个县域位于苏南和苏中,第四级为最低水平人口城镇化级,第四级县域数量为12个,其中8个位于苏北,所以苏中人口城镇化水平高于苏北。对比苏南和苏中的人口城镇化综合发展水平,苏南人口城镇化水平又总体上高于苏中,即 $UP_{苏南} > UP_{苏中} > UP_{苏北}$ 。苏南人口城镇化平均指数为0.18,而苏北则为0.06,苏南地区人口城镇化水平平均值为苏北地区的3倍,二者差距较大。出现这种格局的原因在于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非均衡性,苏南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较高,提供了较多的就业岗位,加之较高的教育、医疗、社会公共服务水平,吸引了大批农村人口及外来人口进城就业及居住。苏北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相对落后,就业岗位有限,城市公共服务水平相对较低,因此人口城镇化水平相对较低。苏中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和城镇化水平介于苏南和苏北之间,需要注意提高经济发展水平,创造就业岗位,提升社会公共服务水平,这样才能产生人口引力,实现人口城镇化水平的提高,缩小与苏南的差距。另外,对于市辖区和一般县域,市辖区人口城镇化水平高于一般县域。这符合市辖区经济相对发达,对外来人口吸引力较强的原理,也反映了城镇化过程中郊县向中心城区迁移的现状。

由江苏省城镇化用地综合发展指数图(见图3)可以看到,江苏省城镇化用地分为4级,其空间格局总体上呈现出和人口城镇化较为相似的区域分布规律,即 $UL_{苏南} > UL_{苏中} > UL_{苏北}$ 。城镇化用地水平较高的地区多分布在苏南和苏中,苏北多为三级和四级水平,只有徐州市市辖区和连云港市市辖区位于城镇化用地第一级。从均值水平看,苏南地区城镇化用地水平指数均值为0.30,而苏北地区为0.05,苏南城镇化用地均值指数为苏北地区的6倍,二者差距较大。市辖区与郊县(县级市)对比,也呈现出明显的 $UL_{市辖区} > UL_{郊县}$ 特征。原因在于郊县经济发展水平相对滞后,城市功能不完善,土地价值相对较低,土地需求量小,非农化速

度也相对较低。

横向对比人口城镇化与城镇化用地发展水平,可以看出人口城镇化相对高的地区,城镇化用地也相对较高,人口城镇化相对低的地区,城镇化用地也相对较低,表现出二者发展过程中的互为引力,相互拉动的特征。当人口城镇化大于城镇化用地水平时,城镇化用地发展滞后,人口的城镇化需要发展的土地空间,增大土地需求,拉动城镇化用地。当城镇化用地大于人口城镇化时,在一定程度上,城镇化用地为人口城市提供了发展的空间,但由于城镇化用地供给过度,土地价格下降,较低价格的土地增加了市场的需求,吸引了更多的投资 and 项目,也拉动了人口的城镇化。当然,二者的互动是在良性均衡发展状态下进行的。如果二者处于失调状态,若城镇化用地远大于人口城镇化,会造成土地资源的闲置和浪费,出现“空城”和“鬼城”现象;当城镇化用地远小于人口城镇化时,土地空间的“瓶颈”制约人口城

镇化的发展,成为城镇化发展的阻力。所以,在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需要注意人口城镇化和城镇化用地的均衡发展,产生良性互动,这样才能发挥二者的最大功效,促进城镇化健康发展。

(二) 滞后类型的空间异质性

虽然城镇化用地水平与人口城镇化存在空间格局的相似性,但对比人口城镇化与城镇化用地综合发展水平,可以发现二者存在一定差异。当 $UL>UP$,为人口城镇化滞后型(或城镇化用地过度型);当 $UP>UL$,为城镇化用地滞后型。根据江苏省县域人口城镇化与城镇化用地滞后类型的空间格局图(见图4)可知,城镇化用地过度型主要分布在苏南及苏中地区。土地过度空间扩展导致很多问题,一是建成区的空置和浪费,土地利用的低效率化和土地资源的浪费。二是房地产业“泡沫”的逐渐增大,威胁国家经济的平稳发展。

城镇化用地滞后型主要分布在苏北地区,对于城镇化用地滞后型的区域,应该在注意土地集约利用的前提下,扩展城市发展空间,提高土地投资和土地产出,提升城镇化用地水平,为人口城镇化提供空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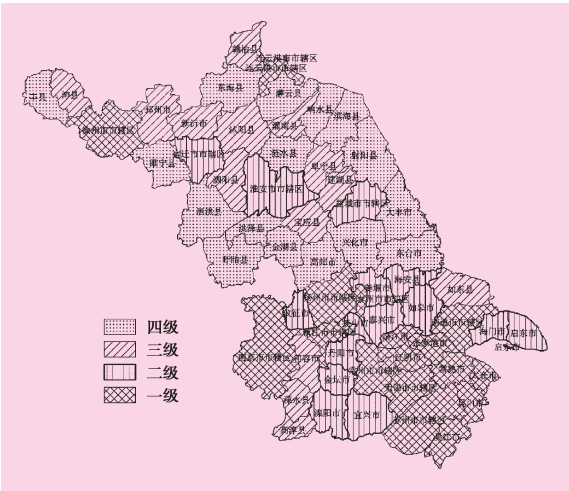


图3 2011年江苏省城镇化用地综合发展指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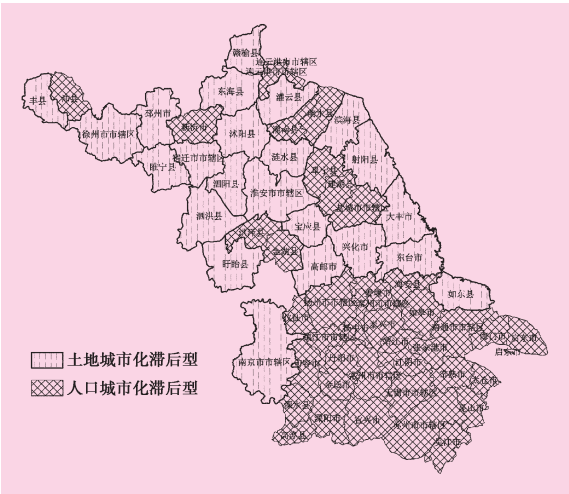


图4 江苏省人口城镇化与城镇化用地的滞后类型

支撑,促使二者的良性互动、均衡发展,最终提高区域城镇化综合水平。

(三) 均衡发展类型的空间异质性

根据均衡发展模型,将 64 个县域划分 5 个等级(见图 5)。第二级包括的南京、苏州和无锡市市辖区为初级发展均衡型。第三级包括的常州、徐州、南通和扬州市市辖区为均衡发展过渡型。第四级包括的淮安市市辖区、盐城市市辖区、宜兴市、常熟市、连云港市市辖区、镇江市市辖区、宿迁市市辖区、如皋市、溧阳市、泰兴市、沛县、海安县、邳州市、启东市、沭阳县、如东县、海门市、丹阳市,共 18 个县域,为滞后发展失调型。其余的为第五级,江苏省县域没有一级均衡发展型,说明县域城镇化均衡发展水平总体还不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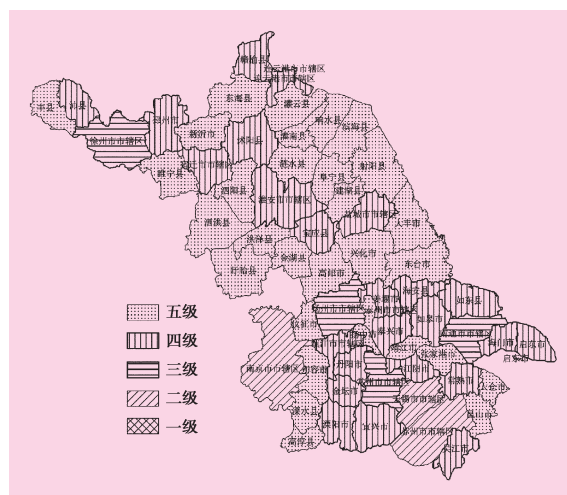


图 5 江苏省县域人口城镇化与城镇化用地均衡发展等级

在空间布局上看,初级发展均衡型均位于苏南地区,均衡发展过渡型主要位于苏南和苏中,而苏北多为落后发展失调型和滞后发展失调型,说明在不同城市均衡发展类型上也存在空间的分异,即总体上存在 $D_{\text{苏南}} > D_{\text{苏中}} > D_{\text{苏北}}$ 。从平均水平上看,苏南耦合发展度均值为 0.28,而苏北则为 0.18,二者差距较大。原因在于苏中地区一般都同时具有较高城镇化发展度和耦合度,苏北地区即使有较高的耦合度,但其城镇化发展度不及苏南地区,较低的城镇化发展度拉低了耦合发展度。

虽然苏南地区均衡发展水平总体上高于苏北,但苏南地区内部也存在异质性的特征。苏南地区多为初级发展均衡型和均衡发展过渡型,而句容县、溧水县、高淳县、张家港市、太仓市、昆山市为落后发展失调型,这几个县市与苏南地区的整体城镇化均衡发展水平差距较大。经过分析可知句容县、溧水县、高淳县均衡发展水平较低的原因在于其城镇化发展度较低,即城镇化用地水平和人口城镇化发展水平较低。低水平的发展度拉低了其均衡发展水平。因此需要注意城镇化用地和人口城镇化水平的提高,破除二元城乡“壁垒”,加强城市建设和公共服务(王小鲁,2010),创造良好的就业环境和实施优惠的就业政策,吸引更多的农村人口进城发展,并注意开拓城市发展空间,为人口城镇化提供土地空间的支撑。而对于张家港市、太仓市、昆山市,其人口城镇化和城镇化用地都处于相对较高的水平,发展度处于较高的水平,但其耦合度却不高,均在 0.1 以下,较低的耦合度拉低了均衡发展水平。这三市需要注意人口城镇化与城镇化用地的发展的均衡性。由于此三市的耦合度低的原因在于城镇化用地的过度开发(见图 4),在城镇化进程中要防止土地的过度开发征收,要注意内部挖潜,努力提高土地利用效率,实现土地集约利用。不能单纯追求城镇化用地过程中的土地收益,而要更多地考虑长远的社会效益和综合效益,实现城镇化用地与人口城镇化的

均衡性发展、良性互动。

五、结 语

本研究结果表明,江苏省人口城镇化与城镇化用地综合水平、均衡发展度存在省域的均衡性及省内不同区域的非均衡性。苏北地区的城镇化发展与苏南、苏中地区有较大差距,其城镇化发展度较低且属于城镇化用地滞后型,该地区应该注意在集约利用土地的前提下,促进城镇土地空间的扩展。苏南、苏中地区城镇化发展水平相对较高,属于人口城镇化滞后型,城镇化用地过度,需要防止盲目追求利益而导致的过度城镇化用地,保证城镇化用地与人口城镇化的协调发展。需要注意的是,苏南地区城镇化虽然较苏北和苏中地区有较高的耦合发展度,但仍处于初级发展均衡阶段,在以后的发展中仍然要注意人口城镇化与城镇化用地扩展中的均衡性,避免城镇化用地过度问题,努力实现高层次的城镇化均衡性发展。

总之,城镇化发展过程中,人口城镇化与城镇化用地的非均衡性与均衡性同时存在。人口城镇化与城镇化用地在宏观区域总体呈现均衡性,但由于其内部空间的异质性,使其具有尺度敏感性,总体往往不具备内部个体代表性,即国家内或省域的人口城镇化与城镇化用地发展的均衡性,并不意味着内部城市个体的均衡性。人口城镇化与城镇化用地关系的研究需要以单个城市(或县域)为基本单位进行才具有意义。不同城市均衡性发展阶段、滞后类型不同,需要针对不同城市 and 不同发展类型,采取相应的措施实现城镇化健康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1. 白先春等(2005):《我国县级城市发展质量综合评价——以江苏省县级市为例》,《统计研究》,第7期。
2. 毕丽芳、马耀峰(2013):《交通通达性与省域旅游经济的耦合协调度分析——以云南省为例》,《西安财经学院学报》,第1期。
3. 陈凤桂等(2010):《我国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协调发展研究》,《人文地理》,第5期。
4. 戴中亮等(2010):《城市化与失地农民》,《城市问题》,第1期。
5. 范进、赵定涛(2012):《土地城镇化与人口城镇化协调性测定及其影响因素》,《经济学家》,第5期。
6. 国家统计局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2010):《新中国六十年统计资料汇编》,中国统计出版社。
7. 辜胜阻、杨威(2012):《反思当前城镇化发展中的五种偏向》,《中国人口科学》,第3期。
8. 胡存智(2013):《城镇化进程中的土地制度改革》,《上海经济》,第5期。
9. 江苏省统计局、国家统计局江苏调查总队(2000~2012):《江苏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出版社,相应年份。
10. 李明月、胡竹枝(2012):《广东省人口城市化与土地城市化速率对比》,《城市问题》,第4期。
11. 廖重斌(1999):《环境与经济协调发展的定量评判及其分类体系——以珠江三角洲城市群为例》,《热带地理》,第2期。
12. 王小鲁(2010):《中国城市化路径与城市规模的经济分析》,《经济研究》,第10期。
13. 王永明、马耀峰(2011):《城市旅游经济与交通发展耦合协调度分析——以西安市为例》,《陕西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第1期。
14. 姚士谋等(2011):《中国城镇化需要综合性的科学思维》,《地理研究》,第11期。

(责任编辑:朱 犁)